

近代上海佛教界护国抗日活动述论

◎ 吴 平

上海近代佛教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从 1911 年辛亥革命至 1949 年 5 月 28 日上海解放。这一历史时期,是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激烈、最深刻的时期,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过渡和转型的时期,也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。

1928 年“济南事变”后,随着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,上海佛教界逐渐减少了同日本佛教界的交流,并多次呼吁日本佛教徒反对日本军国主义,抵制其对中国的侵略。此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,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,也中断了中日两国佛教界在平等、和睦基础上进行的佛教文化交流。

中国佛教界一向有护国爱教的传统,佛法也强调报答国恩的必要性。当日寇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的时候,上海佛教界不再寂静了,从高僧大德到普通僧尼,同仇敌忾,投身于护国抗日的活动中。

1931 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圆瑛法师通告全国佛教徒,启建护国道场,以宗教的形式激发爱国抗敌之情感,以此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。并代表中国佛教会对日本佛教界发表声明,谴责日本军国主义“占据中国领土,残杀中国人民”,认为日本此举既有损国家名誉,也违反国际条约。圆瑛法师号召日本佛教界“共奋无畏之精神,唤醒全国

民众”,“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”。^[1]

上海佛学书局自 1933 年 3 月起,首倡在上海永生电台播送佛经,此后又请高僧、居士播讲佛学,同年 3 月 12 日,请太虚法师播讲《佛法大意》。5 月 7 日,又请太虚法师播讲《佛教与护国》。当时日军占领榆关,侵略热河,国难日深,太虚法师以佛教入世精神号召僧众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力,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。太虚法师恰如其分地使佛法护国理念与抗战救国思想融会贯通,对于进行抗日救亡宣传,发挥佛教的社会功能,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^[2]由于无线电广播不受时间、场地限制,也不受气候影响,因而覆盖面广,听者众多,从而在大范围内传播了佛法护国的教义,扩大了佛教护国思想的影响。

上海佛教界还尽其所能,捐款捐物,支援抗战。1933 年 2 月,静安寺住持志法法师对日寇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极度愤慨,特将寺产一部分出租给南京路福禄寿公司,得租金 5000 元,全部捐献给东北义勇军。^[3]

这一时期上海佛教界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护国息灾法会,其内容有超度阵亡将士、护国退敌、祈祷和平,有些大型法会还对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日寇大举进攻热河,致使生灵涂炭,朱子桥目睹惨状,于是请诺那尊者前往上海修息灾大法,祈

祷和平。1933年4月15日,诺那尊者来到上海闭关九天,修十三轮金刚大法,道场设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内。同年5月4日,诺那尊者再次来到上海闭关修火轮金刚大法,道场设在闸北联艺善社。诺那尊者还多次主持“大白伞护国法会”,传授旨在镇护国家,退却强敌,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经咒、仪轨,增强了信众护国抗日的信心。^[4]

1936年5月,由太虚、圆瑛、王一亭、屈映光、朱子桥、江味农、范古农、关纲之、简玉阶、赵朴初等229位上海佛教界人士和14个佛教团体联合发起,在上海佛教净业社内启建了规模盛大的丙子息灾法会,同时成立了由163人组成的理事会,设有常务理事70人,王一亭任理事长,朱子桥、屈映光任副理事长。丙子息灾法会以挽回人心、潜消劫运为宗旨,由5位法师主持其事,其中荣增堪布任藏密主座,修大威德息灾大法;觉拔堪布修大威德五部大法;持松法师任东密主座,修尊胜佛顶法;常惺法师开讲《华严经·行愿品》;能海法师开讲《菩提道次第论》。丙子息灾法会讲经3座,修法5坛,每日参加的僧俗二众甚多,称得上是当时中国盛况空前的一次大法会。^[5]

1936年11月,在全国民心激奋,纷纷起而要求抗日的形势下,菩提学会与上海佛教净业社联合启建了上海护国息灾法会,以弘扬净土、劝发悲心、护国息灾为宗旨。该法会成立了理事会,推举王一亭为理事长,朱子桥、屈映光为副理事长。法会道场设在上海佛教净业社,设办事处于仁济堂菩提学会。办事处设法务、宏扬、文书、会计、庶务、招待6组。11月21日下午8时净坛,22日起由印光法师主建大悲佛七道场7日,每日为大众宣说净土法要,万指围绕,莫不欢喜信受,圆瑛法师领众薰修,当时的著名居士皆亲临参与念佛。护国息灾法会于28日圆满,达到了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护国抗日作出贡献的目的。印光听说抗战中的绥远灾情

严重,当场就将1000余人皈依求戒等香仪共计2900多元尽数捐去。^[6]

上海佛教界举办的护国法会尽管是寄希望于佛祖菩萨的保佑,但不可否认的是,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,将佛法护国救民的理念与抗日救亡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,对于增强佛教信众护国救民、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勇气,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上海佛教界还成立了护国抗日组织。1936年11月,中国佛教会鉴于国难日亟,灾祸纷乘,拟具“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章程”,并制订了《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僧众训练班纲要》,呈请内政部、民众训练部备案。12月17日,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在上海开始办公,圆瑛法师任总团长,宏明法师任总干事。12月18日,抽派留云寺、灵山寺等寺40名壮年僧众,编队受训。各地寺庙,亦由总团部署限期成立分团,普遍受训,以备非常。^[7]

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由赵朴初居士等人发起,于1937年1月8日在上海成立。该会以“联合国内佛教徒弘宣佛教慈悲喜舍之教义,实行菩萨利他救苦之愿行,维护国家,倡导和平”为宗旨,实际目的是抗日护国,反对内战,事实上也起到了促进抗日护国、停止内战的作用。王一亭、黄涵之、屈映光、大悲、常惺、赵朴初等53人当选为理事,大悲法师任理事长,赵朴初居士任总干事。会址设在上海,各省市县设立分会。会务包括弘扬佛法、救护灾区、宣传和平、举办其他利益群众事业等。^[8]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至“七·七”事变前,上海佛教界积极开展护国抗日宣传,谴责日寇侵华行为,举办护国消灾法会,组织护国抗日团体,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,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组织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,救死扶伤,开办收容所救济难民,掩埋阵亡士兵尸体,赴海外募集款

项支援抗战，是抗日战争中上海佛教界最令人敬佩的爱国壮举，对激励上海军民英勇抗战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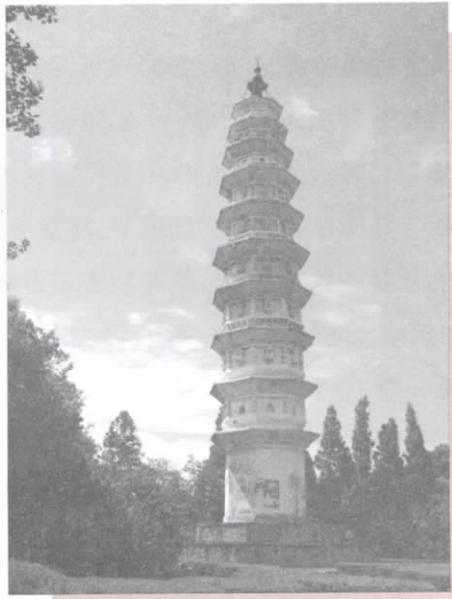
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在上海的中国佛教会立即召开理事紧急会议，决定召集佛教青年，组织僧侣救护队。由圆瑛法师负责训练佛教青年，在战区担任救护工作。

圆瑛法师将宏明法师介绍给屈映光，建议他们负责办理上海僧侣救护队的具体事宜。消息传出，很快就有一百多名青年僧人报名。救护队迅速宣告成立，队址设在上海法藏寺内，由宏明法师亲自领导训练。屈映光任总队长，宏明法师任副总队长。

同年8月13日，日寇在上海发起大规模进攻，上海军民奋起抵抗。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，支援中国抗日军队。出发前，圆瑛法师对上海僧侣救护队全体队员发表讲话。他要求每一位队员都要以“大无畏、大无我、大慈悲”的“三大精神”来做好配合抗战的救护工作。“大无畏”就是无所畏惧，不怕脏，不怕累，不怕难，不怕死，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出生入死的抗战救亡中去；“大无我”就是忘却身家之我见，置自身生死于度外去救护伤员；“大慈悲”就是救苦救难。

上海僧侣救护队冒着敌人的炮火，抢救伤员。他们往返浏行、大场、昆山之间，不分昼夜地工作着，同时还救护租界内被日寇飞机炸伤的无辜同胞。在枪林弹雨中，有的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有的队员被敌人的炮弹炸伤，成为残疾人。他们用自己的气力、汗水、鲜血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光荣的一页。

由于上海僧侣救护队工作出色，赢得了社会舆



论的普遍赞扬。据《救亡日报》1937年9月22日报道：“该会（指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）除了收容难民之外，还组织了救护伤兵队——僧侣救护队，参加这一工作的有170余人，全是平日吃素念佛的和尚，他们上前线救护伤兵的勇敢，是谁都及不上的。在不久之前，他们曾因救护伤兵给敌人的炮火打死了几个。”《申报》1937年9月26日报道：“该队在工作时，

虽迭遇险阻，而遭受重大牺牲，然仍勇往直前，百折不回。尤以宏明法师，不避艰险，每日必率队赴最前线，监督救护，其勇敢服务之精神，殊堪钦佩。”^[9]相比之下，“慈联会”还成立了一支由世俗人士组成的救护队，由于没有工作实绩，不久被撤销。只有僧侣救护队在支撑着“慈联会”的门面。这是因为佛教信仰使他们有出生入死的精神，有舍己救人的慈愿，再加上无父母妻儿的牵挂，故不怕危险，能够做出成绩来。据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1938年报告书记载：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之战中，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8273人。救护队员视死如归、救死扶伤的事迹每日均见诸报端，家喻户晓，为中外舆论所称道。中国报刊将他们誉为“英勇僧侣”，外国报纸称他们为“战神之敌”。在当时上海各种救护组织中，只有这一杆“佛”字旗最生色，最动人！

当时，上海佛教界抗日护国的组织工作安排得十分周到，前方有救护队，后方则有收容所。中国佛教会在觉园内成立了难民收容所，收容难民3000多人，并供给全部饮食医药。还有比丘尼主动为前方官兵缝制征衣，也有比丘尼担任医院看护和杂工。

淞沪之战后期,僧侣救护队在枫林桥将 300 多名伤兵抢救出来,送往租界。当时租界里的医院都住满了人,无法收容。宏明法师向社会发出紧急呼吁,要求各方支持,立即成立一所佛教医院,收容治疗这 300 多名伤兵。当天就得到名绅祝兰舫的响应,愿意无条件地把他在牛庄路上的一所大宅院腾空交出来,作为佛教医院的院址。又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,聘请医护人员,捐助药品和医疗器材设备等。不到两天光景,一所粗具规模的佛教医院诞生了。

当时南市一带都被日军占领。僧侣救护队员们从战地抢救转向担任佛教医院的看护,为 300 多名伤兵服务了一个时期。待 300 多名伤兵痊愈后,又设法送往后方归队,使他们可以继续杀敌。僧侣救护队又在佛教医院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“超度阵亡将士法会”,以慰为国牺牲者的英灵。然后全体队员化整为零,瞒过敌人的视线,秘密转往武汉工作。

1937 年 8 月,屈映光、黄涵之、赵朴初等居士建立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,由赵朴初居士担任收容股主任,专门负责难民收容工作。在赵朴初居士的艰苦努力下,先后设立了 50 多个难民收容所,收容难民 50 多万人次,占当时上海市收容难民总数的近一半,是上海市收容时间最长、工作最好的收容机构。赵朴初居士制定了对难民进行抗日救亡教育、安排生产自救和动员青壮年难民上前线的详细计划。从 1937 年 9 月起,陆续输送了青壮年难民 3000 余人赴皖南、苏南参加新四军,为抗战增添了新生力量。^[10]

1937 年冬,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陷,四郊战场堆满尸体,日军方面仅掩埋日本死亡士兵,中国阵亡士兵及难民的遗骸无人过问,尸横遍野,惨不忍睹。于是中国佛教会又在上海组织掩埋队,圆瑛法师任总队长,范成法师任第一队队长,慧开法师任

第二队队长,两队队员都是上海玉佛寺、法藏寺、清凉寺、国恩寺、关帝庙、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。大家都是主动踊跃参加,集中食宿,每天一大早出发,有四辆汽车开出,车上备有绳索、竹杠、铁铲、铁钩、担架等工具,每人带有防毒面具、药品以及食物,准备整天工作。队员们每天都是抬的抬,埋的埋,一直忙到傍晚,才收工回来。掩埋工作,自 1938 年 2 月开始,至 5 月结束,共计掩埋尸体 10000 多具。

上海佛教界还充分发挥佛教的国际性特点,利用赴海外讲经的机会弘扬佛法护国的理念,介绍国内抗日形势,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,募集款项,支援祖国抗战。

由于当时救护队、佛教医院和各地收容所的经济发生困难,1937 年 10 月 15 日,圆瑛法师呈文内政部,要求“赴南洋、新加坡、槟榔屿等处筹募捐款,以期救护团得及早充实力量,发挥救护工作之效能”。礼俗司 10 月 22 日在致内政部的呈文中回复:“出外募款一节,似尚可行”、“拟批示照准”^[11]。圆瑛法师于是前往南洋等地筹集经费。

11 月 17 日,圆瑛法师抵达新加坡,开始讲经。十二月上旬,圆瑛法师至总商会演讲,号召炎黄子孙共赴国难,组织“中华佛教救护团新加坡募捐委员会”,所募捐款皆由募捐委员会统收统汇至汉口香山寺,由该寺海镜和尚组织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二僧侣救护队,开赴前线。

圆瑛法师又先后去吉隆坡、槟榔屿(今马来西亚)、怡保、马六甲等地,请求当地的华侨们各自组织筹款救国委员会,并利用在这些地区讲经之机,向当地侨胞介绍祖国抗战情况,极力宣扬筹款救国的大义,赢得了广大侨胞的热忱捐助。所收捐款一面汇沪,由中国佛教会转发各慈善团体、收容所及佛教医院;一面汇款宁波,请施祥寺住持智圆和尚为队长,组织第三僧侣救护队,开往浙江富阳工

作。

1938年6月,圆瑛法师回国视察各收容所和佛教医院的情况。9月,再赴南洋,向各地侨胞报告国内僧侣救护队情况,继续筹款,发起“一元钱救国难运动”,用佛法激发广大侨胞、尤其是佛教信众的护国热诚,总计募得十余万元,由各筹赈会汇至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,供各收容所支用。^[12]

1937年11月12日,中国军队撤离南市,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陷,各地僧尼纷纷避难租界,寺庙也随之增加了不少。由于玉佛寺、静安寺、法藏寺等都在英、法租界范围内,因而这些寺庙除了致力于救济难民事业外,还能继续弘扬佛法,如法藏寺的法云印经会就印了不少佛学书籍。

1941年12月8日,日军进入英法租界,这就给租界内的寺庙和佛教团体的弘法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

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,上海佛教界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,而是在逆境之下做好弘法工作。以静安寺为例,该寺在1942年举办了40多期佛学星期讲座,影响极大。佛学星期讲座由著名法师和居士主讲,其内容有丁福保居士讲《佛学与科学》、范古安居士讲《佛教与人生》、马公愚先生讲《佛学与艺术》、持松法师讲《佛教与哲学》、圆瑛法师讲《佛教与做人》、赵朴初居士讲《大乘佛学与救济事业》、姚明辉先生讲《佛学与孔学》、赵百辛居士讲《佛教与文学》等。佛学星期讲座停办后,静安寺又举办了不定期的佛学讲座,邀请兴慈、持松等法师轮流主讲,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。^[13]

抗日战争时期,上海佛教界出现了一批令人景仰的爱国高僧:日寇侵略中国,到处烧杀淫掠,无恶不作,同时又企图通过“宣抚”,宣扬“提携”、“亲善”、“东亚共荣”、“王道乐土”,以笼络人心。由于中国佛教徒众多,因此日军各部队都置有“随军佛使”,每至

一地,就物色不肖僧人出面成立汉奸组织,受其操纵,以实现其“以华制华”的目的。上海沦陷后,日本僧人拉拢部分中国僧人和居士,于1939年2月建立“中支宗教大同盟”,协助日军进行“支那宣抚工作”,分为神道部、佛教部、基督教部、总务局等四个分支机构。该组织的直接后台是日军特务机关,后来由兴亚院监督管理。1939年6月,圆瑛法师自南洋回到上海,住圆明讲堂。不久,日本僧人藤井草宣前来邀请圆瑛法师出任“中日佛教会”会长,遭到拒绝。10月19日,恰逢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之日,突然有数十名日本宪兵冲进讲堂,以抗日分子罪名,将圆瑛法师及其弟子明暘法师逮捕,送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严刑审讯。圆瑛法师除在被审讯时从容陈辩外,其余时间则专心念佛,并以绝食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,坚持了民族气节。日本宪兵见圆瑛法师威武不屈,转而改用软的手段劝诱圆瑛法师与他们“合作”,圆瑛法师则以老病拒之。圆瑛法师是国内外著名的佛教大师,在日本也很有影响,日本宪兵不敢轻易加害,只得释放了师徒二人。后敌伪政府多次要求圆瑛法师出任伪中国佛教会会长,圆瑛法师均以老病推却,对外宣称闭门谢客,专门从事《楞严经讲义》的撰述。但他并未忘怀国家大事,如1942年9月30日对北平中国佛学院师生发表演说:“古云: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余曰:佛教兴衰,教徒有责。”护国爱教的激情,溢于言表。^[14]

上海沦陷期间,持松法师在圣仙寺闭门学佛,拒不接见任何日伪人员。当时日军驻沪司令官河田为了推行其“以华制华”的战略,考虑到持松法师懂日语,企图拉拢他出任日伪上海市佛教会会长,持松法师均以有病推却,并发誓不出斗室一步。他曾叹息说:“吾若离此一步,即无面目见国人及师友。”致使日伪的阴谋不能得逞。

兴慈法师对于护国救民事业,竭尽全力。1940年春,为救济逃难来沪的难民,兴慈法师发起成立了上海佛教同仁会,被推选为会长。日寇侵占上海后,时常封锁某一地区多日,断绝一切交通,造成饿死者甚众。1941年8月,上海南市难民区被日军封锁七昼夜。上海各慈善团体备粮前往救济,均受到日军阻挠。上海佛教同仁会一面向日军交涉,获准运粮前往救济,一面向各界募集各种食品,满载卡车,运往南市难民区赈济,每日受赈者七、八千人,直至封锁解除。^[15]

与上海佛教徒一道抗日的还有外国僧人。如德裔匈牙利人照空,他1923年来到上海,在佛教净业社内巧遇太虚,从此开始研究佛教。1931年,在宝华山隆昌寺受比丘戒后,照空离开中国,至法国南部建立了一座佛教丛林。1933年11月,照空率领他的欧洲弟子来到上海,受到中国佛教会、上海市佛教会、佛教净业社的代表和信众们的热烈欢迎。照空与他的弟子租赁大西路(今延安西路)一所房屋,闭门专修,后寓居西侨青年会内。上海各报刊都报道过照空及其弟子们的活动消息。照空热爱中国,满腔正义,写了很多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文章,发表在欧美报刊上,因而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忌恨。1943年秋,照空遭到日本特务的暗害,在同济医院抢救无效,不幸逝世,安葬在上海第一公墓。

抗战一胜利,上海佛教界立即成立上海市佛教徒庆祝胜利大会,决定筹集6000万元,其中4000万元全部购买毛巾,慰劳抗战将士,毛巾上加印“上海佛教徒敬赠面巾”字样。上海各寺庙在庆祝胜利期间连续举办三天法会,为国祈祷祝福,并超度阵亡将士、死难百姓。《妙法轮》、《觉有情》等佛教刊物还出版了庆祝抗战胜利的专号。

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,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。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,

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日,救亡图存,才是唯一的出路。这也是爱国佛教徒的心愿。上海地区的佛教徒在佛教护国思想的支配下,纷纷将自己的身心性命奉献给民族和国家,毅然肩负起护国救民的历史重任,充分表现了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,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。

(作者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)

【注 释】

[1] 圆瑛:《中国佛教会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》,《佛学半月刊》第2卷第26期(1931年11月1日)。

[2] 印顺:《太虚法师年谱》,194-195页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5年10月。

[3] 《静安寺捐助东北义勇军五千元》,《佛学半月刊》第50期(1933年2月)。

[4] 韩大载:《康藏佛教与西康诺那呼图克图应化事略》,上海瑜伽精舍,1937年铅印本。

[5] 屈映光:《丙子息灾法会办事细则》,《佛学半月刊》第126期,1936年5月1日。

[6] 《上海息灾法会纪胜》,《佛学半月刊》第140期,1936年12月1日。

[7] 《灾区救护团部昨集中僧众开始训练》,《佛教日报》1936年12月22日。

[8] 《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章程》,《佛教日报》1937年1月31日。

[9] 《僧侣救护队易地工作》,《申报》,1937年9月26日。

[10] 赵朴初:《抗战初期上海的难民工作》,《抗日风云录》下辑,149-163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5年8月。

[11]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:《抗战初期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史料选》,《民国档案》1996年第3期。

[12] 明旸:《圆瑛大师年谱》,148-156页,中华书局,2004年10月。

[13] 王文辉:《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静安寺》,《台州佛教》,1994年第3期。

[14] 明旸:《圆瑛大师年谱》,156-202页,中华书局,2004年10月。

[15] 胡松年:《上海佛教同仁会近年工作报告》,《弘化月刊》第83期。